
同志与陌路人：一个局外人对变化国际环境中中朝关系的看法

概述

女士们，先生们：

作为一位在华外国客人，与一个亚洲国家谈论另外一个亚洲国家，尤其是这两个国家还是亲密的盟友关系，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和高度前瞻性的任务。在2004年至2008年我为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FCO）工作期间，我经常来往北京和平壤。

从我离开英国外交部门回到新加坡以来，我对朝鲜半岛较之前有所减少。因此，今天我与大家分享关于中朝两国关系的观点纯粹是我个人的见解，这些见解都是根据我的经验得出的。这只是我个人的拙见，不能断言我的分析是确切的。作为一名有兴趣的局外人，我在此也是本着学习的态度，因为中朝双边关系的走向决定着其他很多问题。

我为何决定把中朝两国关系描述成“同志与陌路人”ⁱ？同志关系理解起来相对比较简单：朝鲜和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曾经并肩作战，有着共同的思想根基。然而，中朝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着差距。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朝两国逐渐分道扬镳，最终变成了陌路人。在论述中朝两国关系要点之前，我想在演讲的第一部分提出一个更加理性的对比，对朝鲜和以色列的同盟关系进行一个横向比较。在演讲的第二部分，我将言归正传，回到“同志与陌路人”这个主题上，探讨在中朝之间国与国关系存续期间的分歧与共同点。最后，我会提出简单的结论，并期望得到您的反馈意见。

1. 朝鲜与以色列：自主同盟的范例？

朝鲜和以色列相距遥远，他们都吸取了对方在思想传统和政治模式上的经验教训。此外，两国发展规模也相差悬殊。有些人可能认为这种比较毫无意义，甚至有些反感。那么，为什么还要对他们进行比较呢？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最近在针对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关于中朝关系最新评论的答复中，对美国 and 以色列的关系进行了临时性比较。他的论点是——毫无疑问，观众对此并不陌生——北京需要对战略成本效益进行分析，从根本上重新考虑对平壤的支持。芮效俭大使的回应认为，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非常重要，因此，不能期望北京放弃其在朝鲜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可能非常有限。为了强调他的观点，芮效俭大使比较了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并指出美国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影响——而不是控制ⁱⁱ。

这种临时性的论证使我想起一位前外交部同事的话，这位同事曾告诉我，以色列和朝鲜造就了尤其顽固的外交官，他们的防卫技能和无耻厚颜亦是如此。尽管朝鲜与以色列之间的这种比较未必可靠，也未必完全，但我认为这是一次有效的实践，能够更全面、系统地理解朝鲜及其与中国同盟关系的走向。有时，中国国内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孤立看待中朝双边关系，或将朝美两国的动向作为朝核问题取得进展的关键。

其他一些专家通过朝韩关系这个视角来研究朝鲜，而有些专家却把朝鲜视为一个例外——一个鲜活的“老古董”。去过朝鲜的人都知道，从多个方面讲，朝鲜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独特国家。如果认为朝鲜是一个由“无理性的”或“邪恶的”统治者统治的“无赖国家”或“隐士之国”，并不妨碍对这个国家的理解。

为了纠正这些例外观念，我们把朝鲜和与其相隔遥远且文化并无联系的国家以色列作个比较，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朝鲜和以色列在同盟关系方面存在着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从基本层面上讲，朝鲜和以色列都是小国，资源匮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民族界限分明。两国大约在同一时间建国，他们在好战的邻国环境中，从外国占领中寻求民族自决。两国都发现他们的合法性会直接受到质疑，其中包括影响国家存亡的基本威胁。尽管朝鲜国土面积稍微大一些，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国家认为自己拥有足够的“战略深度”。两国都有着充满斗争和冲突的历史，同时将其作为各自国家概述中的重要发展经历。

作为其生存战略的一部分，朝鲜和以色列都很重视自力更生，对于朝鲜来说，自力更生在意识形态上被描述为“主体思想”和“先军政治”（军事第一）。同时，作为小国容易在敌对环境中受到伤害的务实观念，促使他们通过与更强大的盟友——朝鲜与中国（和前苏联），以色列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来加强他们的安全。这些关系尽管密切，但也具有高度的战略自主权。以色列和朝鲜都在其国际行为中展现出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这让他们各自的“保护国”付出了重大的外交和财政成本。在军事方面，他们的“战略文化”包括审视和寻求安全的类似倾向。作为被强大邻国包围的小国，我们甚至可以说，以色列和朝鲜在其安全政策上有一种“偏执倾向”，这种倾向是由于对生存威胁的不断感知造成的。强调自力更生促使这两个国家付出大量的物资成本，在无视其主要盟友的情况下追求获得（戴高乐主义者选择的）独立核威慑。

朝鲜和以色列都在1948年建国：以色列于5月建国，朝鲜于9月建国。他们羽翼未丰的身份是在为生存和国家合法性而斗争的冲突中建立起来的。以色列和朝鲜都发动过战争，虽然其目的可以合理地解释为战略性防御，但也有一种先发制人和扩张的意味。以色列的顽固政策以及对其托管边界之外领土的占领使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外交政策变得错综复杂。同样，朝鲜的挑衅行为和扩散政策也为中国带来了麻烦。对于中国而言，这种举动已经超出了无法或不愿约束较小盟友对其安全利益带来直接损失的声誉代价。

首先，为直接应对朝鲜的导弹和核计划，美国在亚洲的盟国积极参与美国倡导的弹道导弹防御（BMD）计划，这有可能削弱中国限制核威慑的可信度。在过去十年里，如果没有朝鲜，日本和韩国可能永远不会在弹道导弹防御计划方面与美国进行广泛的合作。尤其针对日本，朝鲜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为其推行大量新安全立法、提倡防御能力和作战自由提出了正当的公开理由。

其次，朝鲜对核武器的追求有可能成为区域核扩散的导火索，有可能促使日本或韩国走上发展核武装的道路——正如以色列未经宣布拥有核能力刺激了伊朗和叙利亚去寻求他们自己的核计划一样。以色列和朝鲜有限的核武库对美国或中国的威慑姿态毫无帮助。

然而，这些高级盟友未能说服朝鲜或以色列在核计划上悬崖勒马，或者接受延伸威慑的替代方案：正如美国对韩国和日本所做的一样，中国是否曾经考虑把此作为处理朝鲜问题的一种选择？以色列和朝鲜是从美国和中国获得物资援助的最大双边受益者。军事援助是美国援助以色列的最后一项计划，但价值每年仍然会超过30亿美元。中国向朝鲜提供援助的范围更加广泛，举例来说，在金正恩接手朝鲜政权后不久，中国向朝鲜提供了50万吨食品和25吨燃料。这其中是否包含军事援助普遍受到怀疑，有时甚至得到证实：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今年四月在平壤参加阅兵游行的朝鲜导弹发射车是由中国制造的。

美籍华裔学者、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朝鲜问题顾问车维特（Victor Cha）建议朝鲜在威慑战略问题上应该效仿以色列。但尽管在体制层面上有着共性，以色列和朝鲜之间的双边关系还是敌对的。朝鲜向一些以色列不共戴天的敌对国家提供弹道导弹技术：首先是萨达姆执政的伊拉克，然后最近是伊朗。朝鲜很有可能是叙利亚秘密在建石墨气体反应堆的设计者，该反应堆在2007年9月被以色列空军炸毁，该行动至今还未遭到叙利亚的正式抗议。多年来，朝鲜还在努力与巴勒斯坦建立外交关系，而以色列在大多数全球问题上对美国采取支持的立场使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双边关系一直处于冷冻状态。

当然，这种类比也有其局限性。以色列是一个经济和技术都非常发达的强大国家，而朝鲜的经济则永远处于危机之中。朝鲜也有尚未解决的统一问题，其合法性存在问题——在我看来，这是阻碍经济改革的根本因素。朝鲜在国家能力方面还是一个谜：经济虽然疲软，但在组织能力和高压政治方面却依然强大。与朝鲜相比，以色列是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政府，而非名义上的民主政府。因此，通过与美国建立广泛的复杂联系，以色列能够更好地处理同盟关系。朝鲜必须依靠中坚力量和官方关系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这是金正日逝世以来暴露出的一个缺点。中国就其本身而言似乎正在扩大对朝鲜的经济合作，但中国不会直接与金正日家族打交道，这也是中国为满足边境省份发展需求而采取的方式。从这种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根本的地理差异：以色列主要在中东地区影响美国的政策，而中国与朝鲜却有着长长的边境。因此，任何不稳定都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安全，有可能带来大规模跨境人口流动的危险，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会面临来自朝鲜半岛南部的美国和韩国部队联合干预的威胁。

中国在亚洲主导国家过去发动过多次战争的朝鲜半岛有着长期的战略利益。这些利益对观众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因此，在此不再赘述。我只想说，我同意芮效俭大使的观点，即如果冒险放弃其对朝鲜的影响，中国将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此外，地理上相邻以及在朝鲜半岛的许多共同的外部战略利益使朝鲜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拥有一把特有的杀手锏。在与美国打交道时，朝鲜的主要杀手锏是威胁，特别是其核武器和导弹能力，这种威胁一部分是威慑力，一部分是交易筹码。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朝鲜的重大弱点和崩溃倾向却成为了一种力量来源。中国显然希望朝鲜在经济上更加自给自足，在战略上更加包容。但是中国最重要的担心是朝鲜“潘多拉盒子”的不确定性，即政权垮台，权力真空将有可能得到释放。正如英语谚语所说，最好的办法是侍候好“你熟悉的恶魔”，因为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分析也符合韩国的考量，因为朝鲜半岛是否能实现统一主要取决于韩国。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朝韩在背后参与“现实政治”的做法。但是，在李明博总统任期内，“软着陆”的希望逐渐消失，朝韩交往陷入僵局，我们感觉似乎又回到了朝鲜常规军事和“非对称”能力所构成的威胁上。这会使韩国再次认同美国和日本的威胁认知，并将关注重点聚焦在导弹和核扩散上。解决朝核问题的所有“五方”（美国、中国、韩国、日本和俄罗斯）在朝鲜半岛的安全担忧相互交迭，但是程度各不相同。

II. 同志与陌路人：中朝关系分歧与融合趋势

首先，朝鲜和中国可以被视为战友。在战争时期形成的同盟关系会有一种情感上的共鸣，至少现在还有一些活着的人依然记得双方共同做出的牺牲。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许多中国人的鲜血洒在了朝鲜国土上，其中包括毛泽东主席的长子。尽管战争现在正渐渐淡出活着的人的记忆，但中朝关系中的同志友谊依然萦绕在老一辈人的脑海中。对于中国的年轻一代和新领导人，这场战争对从政治上解读这段历史依然非常重要。在英国，朝鲜战争有时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但这种称法既不适合中国，也不适合朝鲜，因为在这两个国家，人们常常会有战争永远不会结束的印象。

从理论角度讲，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坚持认为，共同的威胁认知可以增强同盟关系。但是，自由制度主义学者却坚决主张，随着时间的推移，共同价值观可以超出其原有的战略目的重新塑造和维持同盟关系。这里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朝鲜战争结束后，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中国和朝鲜对于美国在亚洲的遏制政策保持着共同阵线（在亚洲，“冷战”往往是“热点”：尽管朝鲜飞行员在北越上空战斗阵亡，朝鲜半岛依然是发生暴力冲突的一个导火索）。朝鲜和中国的领导人对日本重整军备和走修正主义道路也很担忧。

然而，朝鲜和中国对前苏联的态度也存在着重要的意见分歧。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当中国继续加紧与美国建立邦交关系时，金日成却和前苏联走得越来越远。此举使朝鲜站到了中苏分裂的反面，尽管金日成在20世纪70年代末谨慎地避开了越南的分化，但这还是导致了中朝关系在一段时期内处于持续紧张的状态。此后，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突然中断了对朝鲜的物资援助，使得朝鲜摇摇欲坠的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对于朝鲜来说，中国决定在1992年与韩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被解读为在朝鲜处于紧急关头时的背叛。

目前，韩国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使中朝之间的经济合作相形见绌。2011年，中韩双边贸易额已超过2500亿美元，而中朝双边贸易额仅为31亿美元，两者之间的比例为80:1。但在当代亚洲，经济发展和战略发展可以沿着不同的道路前进。中国和朝鲜对于美国及其盟国在某种程度上继续抱有战略不信任的态度，目前仍然有2.8万名美军士兵驻守在韩国。所以，我们可以说维系中朝同盟的根本“纽带”依然存在，而且非常紧密。

在冷战期间，朝鲜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继续保持着意识形态上的同志关系。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国家意识形态逐渐偏移到树立国家典范上，党的领导还是有着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根基。朝鲜推行自力更生的主体思想，并逐渐将其作为效忠金正日家族的基础。在金正日的领导下，依靠党内正统纲领，“先军政治”使朝鲜的统治结构实现了军事化，但却牺牲了党内正统纲领。自2011年12月金正日去世后，第二代国家继承人正式把基于朝鲜的国家意识形态——“金日成民族”奉为神圣。金日成广场上的马克思和列宁画像最终从悬挂的基座上撤了下来。此举是否会使朝鲜进一步远离中国目前尚不清楚，在某种程度上，这取决于现政权是否可以建立一种更加集中的领导形式的的能力。

如果社会主义不再成为朝鲜和中国之间的思想桥梁，那么他们还可以被视为文化意义上的同志关系？从根本层面上讲，朝鲜和中国的政治文化有着共同的儒家思想传统。许多世纪以来，殖民地时期前的朝中关系在朝贡体制内一直处于稳定状态，朝鲜的家族式领导结构可被视为对该体制的复辟。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中国的一些观察家更愿意把朝鲜的功能障碍看成是中国政治动荡的大逆转。我认为中国的年轻一代缺乏这些参考点，因此他们更容易仅仅把朝鲜看成是一个异类的、守旧的，甚至有点可笑的国家。在平壤举行金日成诞辰一百周年活动期间，针对不合时宜的军事游行，中国的网上情绪呈现出一种以恩赐态度相待的基调。如果中国的大众情绪变成进一步疏远朝鲜，那么中国领导人继续向朝鲜提供物资支持的正当理由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毕竟，朝贡是双向的。当朝鲜在武器和不必要的太空火箭上挥霍开支时，这种做法却渐渐疏远了中国国内的民意。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发展过程中仍然有一些并行的基准。例如，朝鲜寻求核武器和卫星计划所遵循的时间表类似于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时的时间表。

在非政府层面上讲，中朝两国边境人口都曾经在困难时期越过边境到对方国家寻找食物和庇护所。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闹饥荒期间，朝鲜人越过边境进入中国，但在20世纪50年代末也有中国人越过边境进入朝鲜（这一点鲜为人知）。为这些跨国活动提供支持的是大量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人口。在该地区，中国和朝鲜拥有牢固的文化和语言联系，在此情况下，中国和朝鲜可被视为患难同志。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和朝鲜现在是否变成了繁荣时期的陌生人？随着全国大部分地区国家福利和公共分配的真正崩溃以及韩国撤出大规模援助，朝鲜势必会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并从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中获益。在朝鲜市场上交易的消费品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大多数朝鲜人，尤其是生活在边境贫困省份的那些人，非常清楚中国的日益繁荣。朝鲜国家媒体于去年曾宣布一项“幸福指数调查”结果，有趣的是——作为一种可信的宣传运动——朝鲜位居中国之后，排名第二。尽管普通朝鲜人越来越意识到他们自己对中国的依赖性，但收入水平的急剧分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摩擦和怨恨。中国最近正在扩大赴朝鲜的旅行团数量。

根据中国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双向旅游人数大约达到25万人ⁱⁱⁱ。中国快速崛起的反面是，朝鲜人现在更倾向于不欢迎新一波的中国游客，尤其是在当今朝鲜出境率非常高的中国企业家。

再次，与韩国的对比也可以说明问题。在2010-2011年度，超过1200万韩国游客到中国旅游^{iv}，同时大约有200万中国游客到韩国旅游，赴韩旅游人数超过赴日旅游人数，韩国成为中国人最受欢迎的海外旅游目的地^v。虽然与韩国相比，中国与朝鲜的贸易额微不足道，但朝鲜对中国进一步发展其东北部省份的计划却是至关重要的。该计划的一部分内容是改善基础设施，从而改善中国制造商抵达包括朝鲜罗津港口和铁路综合系统在内的海上运输通道，从而更好地完善与中国东部沿海及其他地区的连接。目前，煤炭和其他自然资源从罗津港南部运往中国上海。2007年在朝鲜惠山成立的一个大型铜矿开采合资企业现已经投产。在朝鲜西部，中国近年来的发展范围已经抵达鸭绿江前线地区，并在鸭绿江的一个朝鲜岛屿上专门指定了一个合资特区。相比之下，朝鲜方面的进展却一直很慢。

从商业角度来看，中国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大大强化了一些企业把劳动密集型生产转移到朝鲜工厂的强烈愿望。中国最近作出了更加激进的选择，直接输入朝鲜的劳动力，并决定接受大量的朝鲜合同劳工（最初是4万人，后来增加到12万人），其中包括纺织工人、技术员、机械工人、建筑工人和矿工。据《洛杉矶时报》驻首尔记者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mick）的报道，这些朝鲜劳工已经抵达辽宁丹东和吉林珲春和图们^{vi}。

结论：

我以朝鲜和以色列之间谨慎而有争议的对比开始。我的观点并不是为了证明以色列和朝鲜是一对神秘的“双胞胎”，因为两者之间的差异最终会超过相似之处。进行对比的实际价值主要是表明横向对比之于纵向对比的好处。尽管这只是一次学术实践，但我还是认为横向对比也适应于中国的对朝政策。我们必须在地区背景中考虑中国和朝鲜之间不断发展的特殊关系。为了健康地运作，即使不是更广泛的亚洲整体，至少东北亚的嘴唇和牙齿需要与眼睛、鼻子以及耳朵连接起来。

在地理环境和历史的紧密联结下，朝鲜和中国依然是同志关系。但他们也在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为陌路人。尽管在金日成诞辰一百周年这个最重要的时刻，朝鲜宣称要建立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但现实是朝鲜的政治时钟依然由周年庆祝活动来设定。从这个根本意义上说，朝鲜是一个“向后看”的国家。在许多方面，朝鲜的历史就像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不同寻常的故事。朝鲜的未来不可能轻易被改写，然而，人们都想知道在新领导人的带领下，朝鲜如何做好解决摆在面前不利因素和复杂挑战的准备。无论朝鲜朝着哪个方向发展，中国都不会拥有距离上的优势。

尤安·格雷厄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高级研究员，2012年7月。

参考书目：

拉尔夫·科萨和布拉德·格罗瑟曼，“不合逻辑的中国对朝政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太平洋网，第32期，2012年5月17日

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特别报告：朝鲜农作物与食品安全评估团的朝鲜之旅，联合国，2011年25日

斯蒂芬妮·克莱-阿尔布兰特，“朝鲜：商业开放吗？”国际危机组织，2012年1月12日（网址：www.crisisgroup.org/en/regions/asia/north-east-asia/north-korea/op-eds/north-korea-open-for-business.aspx）

“在向朝鲜施压使其解除武装努力中，北京不予任何一方结盟”，《南华早报》，2012年1月5日

国际危机组织，“红色阴影：中国对朝鲜的辩论”，ICG亚洲报告，第179期，2009年11月2日（网址：www.crisisgroup.org/en/regions/asia/north-east-asia/north-korea/179-shades-of-red-chinas-debate-over-north-korea.aspx）

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对PacNet PacNet #32R的回应——不合逻辑的中国对朝政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Pacnet No. 32R-A，2012年6月7日

斯科特·施耐德和卞始源，“中朝关系：后金正日时代的新挑战”，对比联系第13卷，第3期，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11年12月27日

孙云，“孙云论中国对朝政策的逻辑”，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Pacnet，第39期，2012年6月21日

ⁱ “同志与陌路人：幕后的朝鲜”是作者迈克尔·哈罗德（Michael Harrold）在20世纪80年代末在朝鲜担任英语顾问时关于他亲身经历的报道。我冒昧把他的职务作为中朝关系的比喻。

ⁱⁱ 拉尔夫·科萨和布拉德·格罗瑟曼，“不合逻辑的中国对朝政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太平洋网，第32期，2012年5月17日；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对PacNet PacNet #32R的回应——不合逻辑的中国对朝政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Pacnet No. 32R-A，2012年6月7日。

ⁱⁱⁱ 斯科特·施耐德和卞始源，“中朝关系：后金正日时代的新挑战”，对比联系第13卷，第3期，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11年12月27日。

^{iv} 《环球时报》，“虾与鲸”，2012年6月20日。

网址：www.globaltimes.cn/content/716201.shtml。Hangyoreh在线，“韩国成为中国游客第一旅游目的地”，2011年10月18日。网址：english.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e_national/501258.html。

^{vi} 芭芭拉·德米克，《洛杉矶时报》，“中国雇佣数万名朝鲜外籍劳工”，2012年7月1日（网址：www.latimes.com/news/nationworld/world/la-fg-china-workers-20120701,0,7865597.story）。

